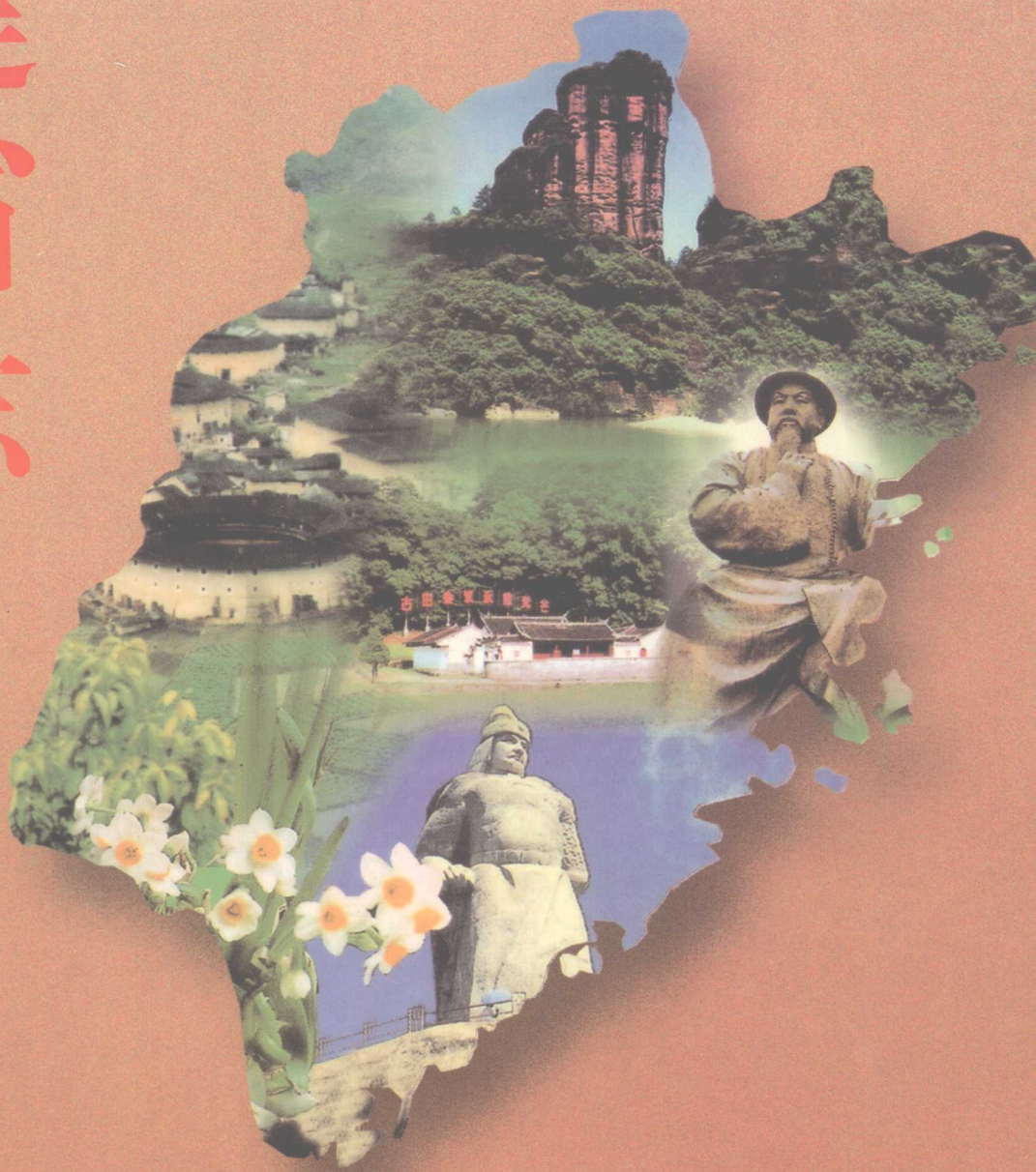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志

出版志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 JIAN SHENG ZHI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志

出版志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211-05509-8

I. 福... II. 福... III. ①福建省—地方志②出版工作—概况—福建省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969 号

福建省志·出版志

FUJIAN SHENGZHI CHUBANZHI

作 者: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责任编辑: 史霄鸿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14

字 数: 82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509-8

定 价: 1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剑珍（专职）

副主任：阮荣祥 周一风 叶双瑜 吴建春 陈俊杰

委 员：林 强 刘万勤 陈祖武 封建安 江金和 马长冰
林炳承 张少钦 吴若三 林国清 吴凤章 董启清
杨 平 陈小平 郑则梅 杨加清 林寿琦 林育辰
倪健鹤 潘心雄

曾在本编纂委员会任职的人员

主 任：陈明义 张 立 刘学沛

顾 问：张格心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莘 王景阁 计克良 卢美松 艾 光 刘玉芳
许怀中 苏炎灶 杨华基 杨建国 陈贤美 陈树田
陈肇胜 顾耐雨 高一哨 唐天尧 程 科 舒 风
游嘉瑞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宠 王 捷 王立勋 王能光 卢增荣 刘立身
刘学沛 庄晏成 任开国 江堤端 李 力 李 智
李 璞 李英标 李宗时 李联明 李德安 张 梁
张荣彩 张振郎 张瑞尧 汪子英 沈继武 邵正元
杨思知 杨理正 陈 俱 陈一琴 陈世谦 陈明端
陈营官 陈挺成 吴玉辉 林光楚 林志群 林祥瑞
周力文 周其祥 赵文才 赵觉荣 郑心坦 郑学檬
顾 铭 凌家榆 曹尔奇 黄 杰 黄心炎 黄文麟
黄启权 黄寿祺 傅圭璧 傅家麟 谢水顺 雷恒春
蔡望怀 廖彩玲 薛祖亮 魏忠义

《福建省志·出版志》编委会

顾 问：鲁 岩 林子东

主 任：白 冲

副主任：杨加清 李瑞良

委 员：陈德峰 舒 亭 管 权 郇世超
于乐人 王炳前 赵文淦 吴世灯

《福建省志·出版志》办公室

主 任：杨加清（兼）

《福建省志·出版志》编辑室

主 编：李瑞良

成 员：吴世灯 林定坤 黄学文 林伯苓 余大潮
官大梁 张秋碧 黄文仲 唐文彬

《福建省志·出版志》审稿人员

卢美松 李瑞良 陈建新 赵文淦 胡善美 谢水顺
施宝霖 刘祖陞

《福建省志·出版志》验收小组

刘学沛 卢美松 杨建国 苏炎灶

《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有用的地情资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各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专业分志，专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史直至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并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各分志的上限从实际历史情况出发，尽可能上溯到顶，下限力求写到完稿之年。

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重点，注意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上通用的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规范。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凡加用编者重新调查核实的数据，均有页末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末注。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出版机构、出版者	(14)
第一节 政府出版机构	(15)
一、古代(1840 年以前)官刻机构、官刻主持者	(15)
二、近代前期(1841~1911 年)官刻机构	(20)
三、民国时期官办出版机构	(20)
四、闽西苏区出版机构	(22)
五、现代国营出版机构	(22)
第二节 民营出版机构	(28)
一、古代刻书坊肆	(28)
二、近代书坊	(33)
三、近代前期(1841~1911 年)民营出版机构	(34)
四、民国时期民营出版机构	(34)
第三节 私家刻书者及社会、团体出版机构	(36)
一、古代私家刻书者	(36)
二、古代宗教刻书单位	(38)
三、近代私家刻书者	(39)
四、近代教会出版机构	(39)
五、民国时期学校出版者	(40)
附一：古代部分官刻名录	(40)
附二：古代部分书坊名录	(41)
附三：古代部分私刻名录	(42)
附四：古代部分刻书书院名录	(43)
附五：古代部分宗教刻书单位名录	(43)
附六：近代前期(1841~1911 年)部分出版机构名录	(44)
附七：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部分出版机构名录	(45)
第二章 图书编辑	(47)
第一节 编辑方式和出版方针	(48)
一、古代图书编辑方式	(48)
二、近代(1841~1949 年)书刊编辑方式	(53)

三、新中国的出版方针·····	(56)
第二节 编辑工序和制度建设·····	(59)
一、古代编辑业务·····	(59)
二、民国时期的编辑环节·····	(65)
三、现代编辑工序·····	(70)
第三节 编辑理论·····	(80)
一、古代编辑理论·····	(80)
二、现代编辑理论·····	(82)
第三章 图 书·····	(83)
第一节 图书分类·····	(83)
一、古代图书门类·····	(83)
二、近代图书类型·····	(89)
三、现代闽版图书类型·····	(90)
第二节 图书内容·····	(96)
一、古代图书内容·····	(96)
二、近代图书内容·····	(107)
三、现代闽版图书内容·····	(113)
附一：古代部分闽刻书目·····	(159)
一、经部·····	(159)
二、史部·····	(164)
三、子部·····	(174)
四、集部·····	(183)
五、丛书·····	(190)
附二：近代（1841~1949 年）部分闽刻书目·····	(191)
一、经部·····	(191)
二、史部·····	(191)
三、子部·····	(192)
四、集部·····	(193)
附三：近代（1841~1949 年）部分闽版（石印和铅印）书目·····	(193)
一、哲学、社会学、政法·····	(193)
二、经济·····	(194)
三、文化教育·····	(195)
四、文学艺术·····	(196)
五、历史地理·····	(197)
六、科学技术·····	(199)
七、其他·····	(199)
附四：1951~1992 年部分闽版书目·····	(199)
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9)

二、哲学·····	(200)
三、社会科学总论·····	(201)
四、政治、法律·····	(202)
五、经济·····	(203)
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206)
七、语言、文字·····	(208)
八、文学·····	(210)
九、艺术·····	(218)
十、历史、地理·····	(220)
十一、自然科学总论·····	(225)
十二、数理科学和化学·····	(226)
十三、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	(227)
十四、医药卫生·····	(228)
十五、农业·····	(230)
十六、工业技术·····	(232)
第四章 期 刊 ·····	(234)
第一节 近代(1841~1949年)期刊·····	(235)
一、萌芽阶段的期刊·····	(235)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1927年)的期刊·····	(236)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的期刊·····	(238)
四、抗战爆发后(1937~1948年)的期刊·····	(241)
第二节 现代(1949年10月~1992年)期刊·····	(246)
一、50年代前期的期刊·····	(246)
二、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期刊·····	(247)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期刊·····	(249)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期刊·····	(249)
第三节 新时期的代表性期刊·····	(252)
第五章 书刊印刷 ·····	(288)
第一节 书刊印刷机构·····	(288)
一、近代书刊印刷业·····	(289)
二、现代书刊印刷机构·····	(293)
第二节 印刷物资来源·····	(295)
一、古代印刷物资来源·····	(295)
二、近代印刷物资来源·····	(296)
三、现代印刷物资供应·····	(297)
第三节 印刷工艺和技术·····	(299)
一、古代印刷工艺技术·····	(299)
二、古代雕印文献·····	(301)

三、近代印刷工艺和装订形式·····	(303)
四、现代印刷工艺和装订技术·····	(305)
第四节 印刷生产能力·····	(308)
一、古代印刷规模·····	(308)
二、近代印刷设备和生产能力·····	(311)
三、现代印刷设备和生产能力·····	(312)
四、现代印刷质量管理·····	(313)
第六章 图书发行 ·····	(349)
第一节 概述·····	(349)
一、古代图书发行·····	(349)
二、民国时期图书发行·····	(351)
三、现代图书发行机构和网点·····	(356)
第二节 图书购销和储运·····	(360)
一、图书购销·····	(360)
二、图书储运·····	(365)
附一：清代四堡外出行销书籍商人名表·····	(367)
附二：晚清、民国时期福建各类书店一览表·····	(390)
附三：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各地、市、县新华书店一览表·····	(412)
附四：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农村集镇新华书店门市部分布情况一览表·····	(416)
附五：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新华书店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418)
第七章 出版管理 ·····	(420)
第一节 机构与体制·····	(421)
一、民国时期的出版管理机构·····	(421)
二、现代出版管理体制·····	(423)
第二节 出版管理措施·····	(424)
一、古代出版管理·····	(424)
二、民国时期的出版管理·····	(428)
三、现代书刊出版管理·····	(432)
四、现代书刊印刷管理·····	(440)
五、现代图书发行管理·····	(442)
六、现代版权管理·····	(446)
七、现代出版计划财务管理·····	(450)
附一：清代福建省禁书目录（一）·····	(462)
附二：清代福建省禁书目录（二）·····	(467)
附三：民国时期福建省查禁部分书刊目录·····	(467)
附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查禁福建部分书刊目录·····	(469)
附五：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永安遭查禁部分书刊目录·····	(470)
第八章 出版群体 ·····	(471)

第一节 出版群体结构·····	(471)
一、古代出版群体·····	(471)
二、民国时期出版群体·····	(480)
三、现代出版群体·····	(485)
第二节 出版群体活动·····	(490)
一、民国时期的书刊印刷工人·····	(490)
二、现代出版团体活动·····	(491)
附一：福建古代部分刻工名录·····	(495)
一、宋元时期·····	(495)
二、明代·····	(498)
三、清代·····	(503)
附二：福建省 1992 年以前出版专业高级职称名录 ·····	(506)
附三：福建省 1992 年以前出版系列（书刊印刷部分）高级职称人员名录 ·····	(508)
附四：福建省 1992 年以前书刊印刷系统（包括兼印书报刊印刷厂）省级劳动模范、先进 生产（工作）者名录·····	(509)
附五：福建省入选历届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论文一览表·····	(512)
大事年表·····	(516)
编后记·····	(544)

概 述

福建出版业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福建位于祖国东南沿海，境内山峦起伏，河谷穿插其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岸曲折，多岛屿，与台湾隔水相望。在地理上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但也常避开北方战乱，社会相对安定。背山面海，既囿于山海之隔，又兼有山海之利。山岚与海风交织，山岳文化的封闭性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兼备。土著居民古闽越人早就生息其间。在历史上，福建的开发是与中原汉族人民入闽造成民族大融合同步的。第一次大融合是战国秦汉时期，以秦闽中郡的设立和汉闽越国的建立为标志；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孙吴的建安郡和晋代的晋安郡为标志；第三次是五代十国时期，以王氏建立的闽国为标志。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碰撞和融合高潮，福建地方文化蓬勃兴起，不仅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而且拥有自己的自然地理优势和独特的历史积累。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的闽国以地方割据政权形式出现，既远离中原地区的政治动乱，又接受中原文化的大量渗透，使得文化空前勃兴。进入北宋以后，福建经济开发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扩及八闽大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都达到空前规模，有些方面还跃居全国前列。

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文化的繁荣。福建从唐代后期就形成了读书好学的社会风尚，并逐渐成为科学文化的发达地区。《宋史·地理志》说，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北宋以后，福建名流显宦屡见，文人学者辈出。仅在王安石变法前后，闽人位居宰臣要职的，就有建安吴育，建阳陈升之，晋江曾公亮、吕惠卿、蔡确，浦城吴充、章惇，同安苏颂等，稍后又仙游的蔡京、蔡卞、叶颙，邵武的李纲、黄潜善等。宰辅以下的更是多不胜数。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称：“七闽二浙……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自然地理因素的独特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为福建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充足条件。

福建古代出版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自宋至明，长时间居全国前列。

根据现有记载，福建出版业肇始于唐末五代（或说始于中唐，但没有充足证据）。在图书编辑、刻印和售卖诸环节中，最早出现的是图书售卖业。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仪礼图序》称：“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这是关于唐代福建书肆的唯一记载，虽是后人所述，没有直接的证明，但福建图书编辑和刻印活动到唐末五代已见诸当时的文献。唐末莆田名士黄滔曾编辑《泉山秀句集》30卷，是一部闽人诗歌总集。在这以前，闽人已有著述，但多以单篇流传。把分散流传的闽人诗歌编为一体，这可以说是福建图书编辑工作的开端。与此同时，福建的图书雕印业也见诸记载。与黄滔同时的莆田另一名士徐寅在《自咏十韵》中写

道：“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钓矶集》卷六，又见《全五代诗》卷八十三）此诗写于泉州，徐寅知道自己的诗赋已在福州“镌印卖”，可见当时王审知治下的福州地区已有图书雕印业和售卖业。徐寅的诗赋集是已知福建最早的坊刻本。福建最早有堂号可考的书坊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刻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130卷的建邑王氏世翰堂。北宋时，福州地区又出现了官刻本。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北宋后期（约1086~1125年），福唐郡庠（即福州府学）曾以景祐监本为底本翻刻班固《汉书》100卷。这是已知福建最早的官刻。最早见诸记载的家刻也在北宋出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北宋名臣蔡襄于嘉祐四年（1059年）知泉州时撰《荔枝谱》一卷，“书而刻之”，手写上板，至南宋时书板“犹藏其家”，可见这是家刻。总之，福建最早的刻本，包括官刻、坊刻和家刻，都在五代至北宋期间出现于福州附近的沿海地区。

南宋以后，福建刻书业进入繁盛时期。首先是闽北建阳一带刻书业高度繁荣。这不是偶然的。唐中期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宋建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闽北位于闽、浙、赣接合部，是沟通福建与中原地区的走廊，建阳则是闽北的交通要冲。随着中原人士的大量南来，闽北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基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建阳麻沙位于闽北走廊的中心，虽地处群山之中，但雕版用木和印书用纸可以就地取材，发展刻书业的物质条件十分充足。这些因素促使建阳一带成为全国最早的刻书基地之一。建阳刻书起源早，发展快，书坊之多，规模之大，刻书数量之巨，技术之精和流传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到南宋时已号称“图书之府”，与蜀刻、浙刻并称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载：“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建阳刻书以坊刻为主。据统计，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二镇书坊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0多家。其中不少是刻书世家，这是古代福建刻书业的一个特点。这些书坊能够做到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主要由于他们讲究经营之道，注意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图书结构和经营机制，力求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些书坊特别重视图书品种和版本选择，聘用当地文人参加编校，创办雕印作坊，建立销售网络，把编、校、印、售诸环节联为一体，成为工商联营企业，实力雄厚。建阳刻书范围广泛，门类众多，包括经史和诸子书、诗文别集和选本、时文和科举应试用书、字书韵书、启蒙读物、通俗小说，以及农书、医书和日用杂书等等。

宋代福建刻书，除建阳、建瓯（建安府治）外，还有闽北的邵武、延平，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南安等地，内地的宁化、汀州、上杭等地，刻书业星罗棋布，遍及八闽。福州是古代大型图书的雕印基地。我国第一部民间摹刻的佛教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就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在福州东禅寺开雕，崇宁二年（1103年）竣工的，共雕印大藏经6434卷、580函，规模比开宝年间朝廷派官员到四川雕印的《开宝藏》还要大，世称《崇宁藏》或《东禅藏》。宋徽宗时又先后在福州开元寺雕印佛经《毗卢大藏》（即《开元藏》），在闽县九仙山万寿观雕刻道经《政和万寿道藏》，都是多达五六千卷的大型图书。在数十年间连续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雕版工程，这充分说明宋代福州地区雕印力量之雄厚。

宋代福建出版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图书流通方面。特别是建阳书坊，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拓展流通范围，把图书销往大江南北，直到朝鲜、日本。南宋时有人说：“文公（指朱熹）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所谓“犹水行地”，就是形容建阳图书流通顺畅，

行销各地。朱熹也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三引）。宋末建阳学者熊禾称“书籍高丽、日本通”，可见建本在宋代就已远销国外。清学者杨守敬说：“建宁书本满人间，世历三朝远百蛮。”既说明其持续之久，又指出其流通之广。

随着刻书业的兴盛，宋代福建开始出现一批出版家和编校人才。建阳余仁仲、蔡梦弼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之后，元代福建出版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首先是因为建阳刻书业继续保持旺盛势头。麻沙、崇化书坊林立，除宋代老牌书坊继续经营外，又出现了一些新书坊，其中不乏规模大、出书品种多的名铺。如叶氏广勤堂，自元至明，世代相传，刻书规模可与余氏相比。其次是在官刻系统中，各地官学刻书异军突起，从学司、府学到县学，都纷纷刻书，蔚为风气。特别是书院刻书，以校刻精细闻名，是刻书业的生力军。此外，私家刻书，也时有佳槧。就刻书系统而言，坊刻仍是主体。就地区而言，沿海地区一度受元初战乱和灾荒影响，但随着生产的恢复，刻书业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福州、泉州等地的儒学、郡庠、书院、儒司等官刻系统，因有学田学粮收入，经济实力雄厚，刻书相当活跃。元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在福州雕印《资治通鉴》294卷，三山郡庠刻郑樵《通志》200卷，福州路儒学先后刻印《礼书》150卷、《乐书》200卷，都是元代著名的大型图书。以坊刻为主体的众多刻书单位，形成了全省性的刻书网络。

元代福建刻书门类也有拓展，书籍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元朝统治者在控制南方以后，逐渐改变民族压迫政策，重视文治，“贵汉人，延儒生”，兴学立教，推崇程朱理学，实行科贡并举，从而使四书五经和科举应试读物成为刻书业的重要项目。其次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平话小说、元人散曲也成为建阳刻书的新品种，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刻书风格方面，元代建阳率先采用黑口，便于折叠装订。建阳坊刻多用简体字和俗字，特别是小说、类书。其中有些简体字一直沿用至今。在序目之后或卷末刊刻牌记，说明版本和刊印情况，兼做广告宣传，元代也已流行。书籍的装帧形式在唐以前的帛书都采用卷轴装。隋唐以后，雕印纸书逐渐改为旋风装、经折装，唐末出现的蝴蝶装是宋代的主要装订形式。南宋以后出现的包背装到元代已十分流行，直到明代嘉靖以后才被线装所代替。此外，元代建阳刻印的平话小说已大量采用插图，上图下文，结构匀称，刀法圆熟，风格浑厚古朴，被称为建安画派。

元代末年，建阳麻沙遭受兵火之灾。经过短时间消歇，到明代初期，建阳刻书业又迅速发展，特别是麻沙以西不远的崇化书坊非常繁荣，使建阳刻书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并进入又一个高峰期。明《八闽通志》卷二五称：“建阳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到明代中叶，麻沙书坊业也已恢复，与崇化隔山相对，书坊如林，称为“两坊”、“书林”。这是建阳刻书的极盛时期。据统计，明代建安、建阳书坊多达90家左右，其中有堂号姓名可考的就有50家左右。最著名的是余氏、刘氏、熊氏、叶氏等。在这些书坊中，不少是百年以上的老铺。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开头有一张书坊图，标明书坊分布情况。据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每月有定期的书市，这在当时是全国仅有的。这种盛况一直保持到清初。康熙《建阳县志》卷一载：“是日里人诸商会聚，各以货

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书坊业的繁荣使建阳成为全国性的书籍商品批发地。

明代福建刻书的地区分布比前代更为普遍。除闽北和东南沿海一带外，闽西沙县、宁化、上杭、长汀等地刻书业也颇为繁盛。除坊刻外，明代福建的官刻和私刻也很发达。

明代福建刻书业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出书的品种数量上。据载明代建阳出现了一卷《建宁书坊书目》，虽未流传下来，但嘉靖《建阳县志》也列有书目，到嘉靖二十四年，建阳刻书已达451种。这以后所刻的建本为数更多。据张秀民估计，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居当时全国各地书坊出书总数之首。据万历年间周弘祖《古今书刻》所列，福建刻书共470种，居全国第一。其中366种为坊刻，占全国坊刻的14.6%。明胡应麟《经籍会通》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这反映了明代福建作为全国性刻书中心之一的特点。就福建全省而言，明代刻书地区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流传之远，都超过了以往各个时代，达到了极盛时期。

明代福建刻书内容更为广泛，经、史、子、集俱备，刊刻最多的是科举应试读物、启蒙读物、通俗文学作品和医书、民间日用书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业性城镇繁荣，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的读者群，适应这个阶层需求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成为刻书的热门之选。据统计，自明嘉靖至泰昌（1522~1620年）年间，建刻小说、戏曲共有23种，占整个明代通俗小说总量的20%左右，居全国第一位。现存明代《三国演义》的建阳刻本就多达13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收录明代建阳书坊刻印的通俗小说有30多种。与此同时，建阳的刻书技术也不断改进，书籍插图水平大为提高，在徽派版画崛起的情况下，仍保持建安画派古朴粗犷的风格。此外，明代福建出现了铜活字印书。嘉靖年间建阳铜活字刻印的《通书类聚克择大全》和《墨子》二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在刻书业繁盛的背景下，明代建阳出现了一批文化素养很高的出版家和编校人才，熊大木和余象斗就是这个时期著名的出版家兼通俗小说家。

除出版家外，从南宋到明代，福建的刻书业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刻书工匠，他们在书版、雕字、印刷、装帧设计等方面技术娴熟，工艺精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达到了当时全国先进水平，甚至影响到海外。特别是元末明初，福建刻工应来华的日本僧侣之聘，东渡扶桑，传播刻书工艺。其中知名的工匠有福州的陈孟才、陈伯寿和莆田的俞良甫。他们赴日之后，寓居京都附近的嵯峨，从事汉籍的刻印工作。俞良甫所刻印的书籍被日本人视为精品，称为“俞良甫版”。这些赴日的中国刻工把雕版技艺传授给日本人，使雕版印刷术在日本广泛传播。当时正是日本“五山文化”兴起之时，五山版书籍大多出于赴日的中国刻工之手。他们直接促进了日本“五山文化”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明代福建刻书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不少书坊刻书粗制滥造，编校不精，质量低劣。这种情况在当时已为人们所诟病。

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古代刻书业，到了明代末期，渐趋衰落。明末清初，从清兵南下到三藩之乱，福建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变，尤其闽北是南北交通孔道，难免兵燹之灾。清初康熙、雍期间，建阳刻书有所恢复，著名文人朱彝尊和查慎行结伴游闽时还有诗吟咏麻沙书坊。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已经失去了明代全盛时的光芒。清代福建的刻书业，应首推福州。

福州本是福建刻书业的源头，宋明时期福州刻书业的繁荣仅次于建阳。到清代，承担大型图书刻印任务的仍然是省城福州。康熙年间刊印的《正谊堂全书》和乾隆年间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书》都显示了福州地区的刻印力量。当时福州的官刻和坊刻都很活跃，官方刻印大型图书时往往借助坊刻的技术力量。同治年间刻印的《重纂福建通志》就是一例。除福州外，沿海的莆田、泉州、漳州和闽西长汀、宁化等地区，也都遍布刻书作坊。泉州涂门街近郊的田庵、后坂等村是刻工聚居之地。长汀四堡刻书业在清中叶曾盛极一时，先后开设大小书坊百十家，“家有藏板，岁一刷印，贩行远近”，刻印业成为全村性的家庭手工业，在外省贩卖书籍的四堡乡民先后多达数百人，足迹远及川、黔、云、贵、两广等地。但四堡书坊规模不大，纯属商业性经营，从当时的市场需要出发，以科举应试和日常生活用书为大宗，文化品位不高，加上刻印技术不精，缺乏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几乎没有刻本流传下来。总的说，在江苏、安徽等江淮地区和北京等地刻书业高度繁荣的情况下，以往建本的销售市场已被苏皖等地的刻本所占领，清代福建刻书业已经衰落，失去了全国性刻书中心的地位。

二

鸦片战争以后，福建出版业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文化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渗透而大量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挑战。福建出版业在各种文化潮流的激荡和冲突中改变了面貌，传统的书坊书铺迅速衰落，近代出版业应时而起。

福建近代出版业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到独立的过渡时期。初起时依附于外国资本，后来又依附于洋务机构。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在境外出版中译新旧约《圣经》和《华英词典》等中文书籍，千方百计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就是说，最早在福建流通的教会出版物是在境外出版的。福建最早成立的近代出版机构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美国卫理公会在福州创办的罗札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该公司采用铅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第一副中文铅字是向香港英华书院印字局买来的。公司主要出版中文《圣经》、传教读物、课本和方言读物，并出版杂志《中华录和传教士录》、《卫理会月刊》等。公司还为厦门、汕头、台湾、香港以及北京、九江等地卫理公会承担印刷任务。1903~1904年间，上海卫理主教会和南方卫理主教会联合罗札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在上海组建中国卫理公会出版社，福州的公司就成为这个出版社的福州分社，一直办到1915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州红衣主教团在福州创办红衣主教团出版社，属海外传教委员会领导，主要出版传教读物。此外，传教士还在福州创办了一些杂志和报纸。由于新式印刷业务日益扩大，传教士又在福州创办新式印刷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美传教士在福州天安寺设立美华印刷所，从上海购进日本产的对开、四开铅印机及圆盘机和铅字，承印各种书刊。继福州之后，厦门传教士也从事出版活动。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促进了福建近代出版业的产生，开始出版西学著作。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由于教学需要，船政学堂在很短时间内编写出《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同治七年（1868年）在福州一家教会办的印刷厂出版。不久此书由船政局法籍监督日意格改编扩大为一般词典，改名《法汉袖珍词典》，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版。除工具书外，学堂还编印数学、天文、地